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

——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

刘 浦 江

契丹语文学的诞生，是20世纪阿尔泰语言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学术进展之一。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形成，缘于1922年庆陵契丹字哀册的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契丹大小字已经得到初步解读。契丹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最难破译的文字之一，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缺乏对译的文字资料，迄今发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数已逾四十，但除了一个不足百字的《郎君行记》外，其它都不是与汉文对译的；其二是缺乏活的语言资料，契丹自公元14世纪以后就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它的语言早已消亡。今天的契丹语文学家在解读契丹文字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某些亲属语言，如达斡尔语、蒙古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东乡语、保安语甚至满语等等，但大量的解读实践告诉我们，契丹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它与上述诸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对这些亲属语言的过分依赖，很可能会影响解读结论的正确性。[1]相对于亲属语言来说，汉文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契丹语言资料显然要可靠得多。如果说前者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探索契丹语语音、语法特征和规律等方面，那么后者却可以直接应用于契丹字的拟音和释义。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外学者在搜集传世文献中的契丹语言资料方面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对于这些资料的来龙去脉却无人予以追究。本文拟就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问题做一初步探讨，希望能够丰富我们有关契丹语文学的知识。

一

就目前所知，最早留意搜集整理契丹语言资料的是宋人，在宋代目录学著作中可以检索到以下三种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书籍。

(1)《辨鸡录》

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著录："《辨鸡录》一卷，不著名氏。契丹译语也。凡八篇。"此书编者估计是北宋时代的归正人或归明人。[2]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该书的最早著录

见于《通志·艺文略》,[3]《通志》成书于绍兴年间,但其中的《艺文略》均抄自各种官私书目,《辨鸠录》一书最有可能是出自徽宗政和间官修的《秘书总目》或高宗绍兴初年秘书省颁行的《四库阙书目》。至于该书亡佚于何时,也大致有据可查。有记载表明,直至明朝末年,《辨鸠录》一书仍存于世。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史部四译载记类:"《辨鸠录》一卷,译契丹人语。"[4]此书目编成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可以确知的是,陈氏世善堂藏书至乾隆以前已散佚无存,《知不足斋丛书》本有跋云:"乾隆初年,钱塘赵谷林先生(昱)赍多金往购,则已散佚无遗矣。"据此推断,《辨鸠录》可能亡佚于清初。

(2)《夷语录》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传记类:"僧惟古译《夷语录》一卷,阙。"[5]对于这条著录需要做点解释。北宋丰富的馆阁藏书,经靖康兵火后"荡然靡遗",及至高宗南渡,遂大力搜访民间藏书,绍兴间编纂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就是用于搜访遗书的一份书目,故凡是秘书省不备者皆注一"阙"字。这部《夷语录》也见于《通志》卷六三《艺文略一》,但郑樵的著录稍有不同:"《译夷语录》一卷(小注:僧惟古)。"这想必也是抄自《秘书总目》之类的书目,但郑樵将"译"字当成了书名,显然是一个误解。关于此书编译者惟古的情况,我只能暂且提供一条很不明朗的线索:《续传灯录》卷十八"百丈元肃禅师法嗣"下列有"瑞州百丈维古禅师"("维古",卷首目录作"惟古")。[6]但不知此"惟古"与彼"惟古"是否一人?惟古编译的《夷语录》,既然南宋初年馆阁藏书中已经阙佚不存,且除了《通志·艺文略》,后来也未见其它官私书目著录,由此看来,大概已毁于两宋之际。

(3)《北虏方言》

尤袤《遂初堂书目》地理类著录有《北虏方言》一书,作者、卷数均不详,这是由《遂初堂书目》的体例所决定的,并非意味着该书作者当时已经无从查考。尤袤为南宋前期人,约卒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7]他所收藏的《北虏方言》一书,其"北虏"理应是指契丹,因此我想此书大概也是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一种文献。据魏了翁说,尤氏遂初堂藏书于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厄于火,[8]《北虏方言》可能即毁于此时。

遗憾的是,宋人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上述三种书籍都未能保存下来。而在辽朝方面,大概不曾有人有意识地对契丹语言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因此在辽代文献中丝毫看不出曾经有过类似著作的迹象。不过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传说值得一提。据傅乐焕先生介绍,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聚居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听到当地的一个传闻,据称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账本",其中记载的契丹人名字和语言与达呼尔语相同;同年内蒙古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中也有类似说法。但傅乐焕先生对此传说颇不以为然。[9]以常识判断,辽朝的契丹语言资料以这种形式保存至今,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最有价值的契丹语言资料,是《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元人所修《辽史》,主要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及题名叶隆礼的《契丹国志》三书。据冯家昇先生的研究,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并没有契丹国语解之类的内容。[10]可见《辽史·国语解》确是元朝史官的创举。那么,我们首先要追究的一个问题便是,《国语解》中的契丹语言资料究竟来源于何处?

据《国语解序》说,辽之"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不有注释以辨之,则世何从而知,后何从而考哉。今即本史参互研究,撰次《辽国语解》以附其后,庶几读者无龃龉之患云"。冯家昇先生遂于《〈辽史〉源流考》中下一断言:"则本卷全出自本书也。惟《语解》次序与目录次序不同。……此卷必系出自众手,绝非一人所为,故名目有异,次序不同,编排时不知检对,亦潦草之甚矣。"[11]

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对《国语解》中的全部198条词目进行了逐条检索,发现其中有15条不见于《辽史》本文:

阿点夷离的、崤里(《国语解》列在《太祖纪》下,以下各条括号中的篇目均为《国语解》所注出处)

解洗礼(《兴宗纪》)

卓帐(《礼志》)

知圣旨头子事(《百官志》)

象吻(《营卫志》)

胡木鉴、鞬马、白耗(《仪卫志》)

捉马(《兵卫志》)

杂丁黄、柢柘、珠二琲、庢中、临库(《列传》)

据我判断,这些不见于《辽史》的条目应该全都出自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陈大任《辽史》,[12]虽然今天已见不到它们的原始出处,但丝毫不影响这些语言材料的可靠性。姑举一例。"阿点夷离的"条释文云:"阿点,贵称;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称。"这条释文已得到辽代石刻材料的佐证。按《耿知新墓志》称其外祖母"封陈国迤逦免夫人",[13]《北大王墓志》谓耶律万辛娶"奚王·西南面都招讨·大王、何你乙林免之小女中哥。……六年内加北大王,封为乙林免"。[14]刘凤翥先生指出,这两方墓志中的"迤逦免"和"乙林免"与"夷离的"词干相同,乃是辽朝贵妇人的一种封号。[15]《国语解》既然将"阿点夷离的"列在《太祖纪》下,说明它不是出自《皇朝实录·太祖纪》,就是出自陈大任《辽史·太祖纪》。

除了不见于《辽史》本文的条目之外,《国语解》中还有不少条目所注篇目与它们在今本《辽史》中的出处不符。按照冯家昇先生的解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国语解》出

自众人之手,“编排时不知检对”,史臣之敷衍潦草造成的。但如果对此类条目进行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如《国语解》在《太祖纪》下列有“糺辖”条,释文云:“糺,军名;辖者,管束之义。”按“糺辖”一词两见于《辽史》本文,一处是《兵卫志序》:“天赞元年,以户口滋繁,糺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以统之。”另一处见于卷五九《食货志》(上):“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糺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太祖纪》虽无“糺辖”一词,但天赞元年十月记有同一件事:“诏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使以统之。”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不难做出如下判断:在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陈大任《辽史》的《太祖纪》中,必定有“糺辖”一词,由于元修《辽史·太祖纪》只叙述了“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的事实,却未说明其缘由,所以才没有出现“糺辖”一词。

《国语解》在《太祖纪》下还列有“神纛”一词,谓“从者所执,以牦牛尾为之,缨枪属也”。而此词仅见于今本《辽史》卷五八《仪卫志》(四)“仪仗·国仗”条:“遥辇末主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这种情况看似属于《国语解》的编排错误,实际上可能另有原因。《辽史》卷一《太祖纪》在唐天祐三年(906年)十二月下记载说:“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我估计,耶律俨《皇朝实录·太祖纪》或陈大任《辽史·太祖纪》在记述此事时本是有“十二神纛”一段文字的,到元修《辽史·太祖纪》时把它省掉了。

《国语解》在《游幸表》下有这样一条内容:“女瓌,虞人名。”查《辽史·游幸表》并无此名,而《穆宗纪》应历十四年八月乙巳条有云:“如硗子岭,呼鹿射之,获鹿四,赐虞人女瓌等物有差。”据我们所知,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只有纪、志、传而没有表,[16]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这不像是史臣们敷衍潦草而造成的一般编排错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是,《国语解》的作者原以为穆宗应历十四年的这条记事理应修入《游幸表》,但后来完成的《辽史·游幸表》却未列入此事,于是便出现了《国语解》所注出处与《辽史》本文出处不符的情况。

通过以上诸例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两点基本结论:其一,《国语解》的取材范围不仅仅限于元修《辽史》本文,还包括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国语解序》所谓“今即本史参互研究”云云,不可信以为真;其二,《国语解》不是在《辽史》成书之后才着手编纂,而是与《辽史》的纪、志、表、传同时开始修纂的,冯家昇先生所谓“名目有异、次序不同”,亦即《国语解》部分条目出处与《辽史》本文出处不符的问题,不全是编排草率造成的。

不过,《国语解》确实存在着许多体例方面的问题乃至内容的乖舛谬误。《辽史》之粗率,在二十四史中可谓首屈一指,《国语解》自然也不例外。总的来说,主要存在以下三类问题。

第一,词条的选择相当随意。《国语解》共计收入198条词汇,其中真正的契丹语词,即使算上姓氏、人名、地名、官名等在内,也不过七八十条,其它的一多半倒都是汉语词汇。故冯家昇先生批评说:“既云‘国语解’,当就辽语之不可解者诠释之,然后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览而周知矣。乃不出此,而固陋就简,信手摘来,美其名曰‘国语解’。”[17]若与《金史·国语解》相比较,《辽史·国语解》内容庞杂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金史·国语解》总计收词125条,基本上全是女真语汇,释文也简练而得其要领,不像《辽史·国语解》释文之随意。为什么辽、金二史的《国语解》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元代史官对契丹语的了解远不如对女真语的了解多,当时分撰《辽史》的四位纂修官是兵部尚书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王沂、秘书省著作佐郎徐昺、国史院编修官陈绎曾,[18]我曾试图从元代文献中寻找他们具有某种程度契丹语言修养的证据,结果一无所获;二是《辽史》的纂修非常仓促,从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到四年三月,前后不过十一个月而已。

第二,内容的编排缺乏条理。《辽史·国语解》基本上按照《辽史》纪、志、表、传的顺序编排,头绪显得凌乱,体例没有章法,在这一点上也远不如《金史·国语解》。《金史·国语解》按词汇内容分类编排,分为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五类,眉目非常清楚。除了体例本身的问题之外,《辽史·国语解》的编排错误确实也不少见,这是部分条目与其在《辽史》本文中出处不符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剋释鲁”条列入《太祖纪》,实见于《太宗纪上》,作“剋实鲁”;“挞林”条列入《太祖纪》,实见于《太宗纪下》,作“闼林”;《世宗·穆宗纪》下共列有五条,其中三条见于《穆宗纪》,两条见于《太祖纪》,而《世宗纪》一条也没有;“堕瑰”条列入《地理志》,实见于《营卫志下》,等等。

第三,部分条目存在硬伤。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国语解》在《景宗·圣宗纪》下有这样一条内容:“万役陷河冶:地名。本汉土垠县,有银矿。太祖募民立寨以专采炼,故名陷河冶。”今查此条出处见《圣宗纪》开泰元年七月:“进士康文昭、张素臣、郎玄达坐论知贡举裴玄感、邢祥私曲,秘书省正字李万上书,辞涉怨讪,皆杖而徒之,万役陷河冶。”末句“万役陷河冶”之“万”指秘书省正字李万,而《国语解》居然将整个句子作为词目,令人啼笑皆非。

尽管《辽史·国语解》存在着以上种种不如人意的问题,但它毕竟是汉文文献中保存至今的最集中、最原始的契丹语言资料,对于契丹文字的解读及契丹语文学的研究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

二

乾隆间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虽然历来颇遭学者诟病,不论对契丹、女真、蒙古语言学还是对辽、金、元历史学的研究,几乎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然而它在当时却是一部影响甚大、在今天的学术界也仍是一部知名度甚高的著作。《三史国语解》中的《钦定辽史语

解》,是我们在梳理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时必须弄明白的一个关节。

关于清高宗下令改译辽、金、元三史及编纂《三史国语解》的动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五日的一道上谕说得很明白:"前以辽、金、元三史内人名字义多未妥协,因命编纂诸臣遵照《同文韵统》所载,详加更正。盖缘辽、金、元入主中国时,其人既未必尽晓汉文,以致音同误用;而后此之为史者,因非本国之人,甚至借不雅之字,以寓其诋毁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亟为厘定,而示大公之本意也。"[19]在乾隆四十七年为改译辽、金、元三史所作的序中,高宗再次表示了他对三史译名"谬寓嗤斥"的不满:"夫《春秋》一字之褒贬,示圣人大公至正之心。若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则出于秦越人视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语言不通,而又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此岂《春秋》一字褒贬之为哉!"[20]对于乾隆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学界历来毁誉参半,其中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大肆禁毁违碍书籍,二是肆意篡改辽、金、元史籍。尽管高宗一再声称改译辽、金、元三史之主旨是"传信示公",[21]但我们从中看到的却分明是他狭隘的民族立场。[22]

《三史国语解》是高宗"钦定"的一部官书,但关于它的成书时间,当时的各种记载却颇多分歧。据《国朝宫史续编》卷九二书籍门一八"字学"载:"《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一部,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校正。"[23]《四库全书总目》谓"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三史国语解》的书前提要则称"乾隆四十七年奉敕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又说"乾隆五十年奉敕撰",[24]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目》则作"乾隆五十一年奉敕撰"。

一部《三史国语解》,其成书时间何以竟有这么多的说法?这要从该书的编纂过程说起。高宗朝之改译辽、金、元三史,最初缘于乾隆十二年对《金史·国语解》的加工。《高宗实录》卷二九五录有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的一篇上谕:

> 近因校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讹舛甚多。……即如所解之中,或声相近而字未恰合,或语似是而文有增损;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今既灼见其谬,岂可置之不论!爰命大学士讷亲、张廷玉、尚书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即用校正之本,易去其旧,其坊间原本,听其去留。[25]

乾隆十二年校刊完成的武英殿本《金史》,书末所附《钦定金国语解》基本上仍维持《金史·国语解》的原有结构,只是每条下注明满洲语音,并据此加以考证而已。但大约从乾隆三十三年以后,高宗就不再满足于过去对《金史·国语解》进行的局部加工,在他此年所作的一首题为《于波罗河屯咏东山笔架峰》的诗中,有一段指斥辽人"捺钵"译音不当的小注,并谓"即如金、辽、元三史中类此者难以枚举,将悉为改译"云云。[26]据我所知,这是高宗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全面改译辽、金、元三史。

为了实现改译辽、金、元三史的既定目标,高宗决定首先重修三史《国语解》。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的一篇上谕对此事原委有比较详细的交待:

> 前以批阅《通鉴辑览》,见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讹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尤为鄙陋可笑。盖由章句迂生,既不能深通译语,兼且逞其私智,高下其手,讹以传讹,从未有能正其失者。……每因摘文评史,推阐及之。并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期于折衷至是,一订旧史之踳驳。今金《国语解》业已订正蒇事,而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辽、元国语续成汇订,未免多需时日,著交方略馆,即将《金史》原本先行校勘,除史中事实久布方策,无庸复有增损外,其人、地、职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确覈改正。其辽、元二史,俟《国语解》告竣后,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厘订画一。[27]

这篇上谕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重修三史《国语解》的工作大概就始于乾隆三十六年,至当年年底,新编《金史语解》即已率先告成,这主要是因为有乾隆十二年的《钦定金国语解》作为基础。高宗因令先将《金史语解》交予方略馆(此时尚未开修《四库全书》,官修史籍主要由方略馆负责),用它来改译《金史》中的女真译语,待《辽史语解》和《元史语解》完成后,也全都照此办理。

那么《辽史语解》和《元史语解》究竟完成于何时呢?何冠彪先生指出,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军机大臣等奏报"承办未竣书籍"16种,其中就包括《辽史》和《元史》,[28]按照《金史》的校改程序,当时《辽史语解》和《元史语解》必已完成,才会开始进行对《辽史》和《元史》的改译工作。[29]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三史国语解》的编纂与改译三史的程序完全悖离了当初的设想,以致《三史国语解》的实际编纂过程竟长达十年以上。

根据近年面世的档案材料,我们现在可以确知改译辽、金、元三史和《三史国语解》的最后完成时间。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和珅等奏辽金元三史办理全竣摺》有下面一段文字:

> 臣等奉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轮班进呈,节次进过《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史》二百十卷,又续进过《辽史》本纪、传、志一百零七卷,此次将《辽史》表八卷改对校正,缮写、装潢进呈,所有辽、金、元三史现在全行告竣。……所有三史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俱依原文字义,触类比音,并详加笺释,以次分帙呈进。……应请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重行编次,分刊于原史之前,并恭请御制序文,冠于卷首,用昭一统同文之盛。其旧史内原有之《国语解》,概行撤去。[30]

按照高宗的最初设想,这项工程的进行步骤应该是首先编纂完成《三史国语解》,然后再根据《三史国语解》对辽、金、元三史进行改译。如果真是照此计划进行的话,那么《三史国语解》应该早就完成了,而现在我们知道的实际情况却是,直到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将辽、金、元三史全部改译完毕之时,和珅等人仍在奏请要"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重行编次"。这种情况应当作何解释呢?不妨替古人设想一下,如果史臣们按照事先编好的《三史国语解》去改译辽、金、元三史,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三史国语解》里没有列入的词汇,所以高宗预想的工作程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由此看来,从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六年,《三史国语解》的编纂与辽、金、元三史的改译工作应该是同步交叉进行的,在后一项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即便已经编出了《三史国语解》,也只能是一个很粗疏的稿本而已;只有在辽、金、元三史的改译工作全部结束之后,才能把所有改译的词汇全都吸收进《三史国语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日,监察御史祝德麟的一封奏折谓"臣于乾隆四十六年编修任内,经总裁八阿哥奏充纂修,偕在事满汉各员逐卷改译,并辑成《三史国语解》恭呈乙览"云云,[31]这段话把改译辽、金、元三史与编纂《三史国语解》的前后因果关系交待得再清楚不过了,所谓"辑成"者,与和珅等人说的"重行编次"是一个意思。总之,辽、金、元三史的改译工作完成在前,《三史国语解》的编纂成书在后。

那么,《三史国语解》的最后编纂成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尊旨将各馆纂办书籍已、未完竣及曾否刊刻、写入《四库全书》"的情况向高宗做一汇报,其中在"纂办全竣现在缮写、刊刻各书单"内,列有"辽金元三史"和"辽金元国语解"。[32]这说明在辽、金、元三史的改译工作完成之后不到半年,《三史国语解》即已编纂成书。不过乾隆四十七年编成的《三史国语解》,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这个样子,还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

首先,我们今天看到的此书刻本或写本都是比较晚的。关于此书的刻本,《故宫所藏殿本书目》卷二有一条著录:"《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四十六卷,清乾隆三十六年敕撰,四十六年刊本,十八册。"[33]这一记载肯定有误。因为高宗在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三日曾发布过一道上谕,谓"《三史国语解》于辽金元三史人名、地名译改颇为详核,久经修辑完竣,交武英殿刊刻。……著传谕八阿哥、金简将现在武英殿所刻《三史国语解》赶紧刊刻完竣,先刷印一部寄至热河,以便核对"。[34]这说明《三史国语解》的初刻本直至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尚未问世。今天所能见到的此书最早的写本,则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提要署"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其次,此书的书名可能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尚未最后确定。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其中史部最后一种书名为《辽金元国语义》,[35]显然这是《钦定辽

金元三史国语解》的别名。据黄爱平教授的研究,南三阁《四库全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四月"缮校全竣",但还留有少数空函待补。[36]《辽金元国语义》既然置于史部之末,可见是后来补入的。这一事实说明,起码到乾隆五十二年四月,《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连书名都尚未最后确定。

再次,有证据表明,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辽、金、元三史的改译工作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冯家昇先生对《辽史》的23种版本进行过比较,他发现在清人改译本中以道光四年殿本的改译最为完备:"名辞之改译,始自四库本,惟库本未尽改,至道光殿本始一律改为今名。"据他说,道光殿本的底本上书有校者姓名,计有章宗瀛、李尧栋、邱庭漋、平恕、黄寿龄、陈嗣龙、王仲愚七人。[37]我们检索一下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就可以知道,这七人全都是一直参与辽、金、元三史改译工作的纂修官[38]。前面说过,《三史国语解》在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已经"纂办全竣现在缮写、刊刻",这样一部篇幅并不算大的书,为何直到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尚未"刊刻完竣"呢?我估计是由于辽、金、元三史的改译工作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仍在继续进行,所以《三史国语解》迟迟不能最后定稿。

这里须附带澄清一个疑问。李学智先生认为,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现存之《三史国语解》系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满洲源流考》系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然而《满洲源流考》卷一八之"国俗三·语言门"却已引及《三史国语解》,可见在乾隆四十六年成书的《三史国语解》之前,必定还有另外一种成书更早的本子。[39]据我查证档案的结果,《满洲源流考》实于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开始纂修,[40]但最后之成书已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41]另外在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的奏折中附有一份"各馆现办各书酌定完竣日期清单",其中《满洲源流考》下注明:"已进过十四卷,未进约七卷;计期于本年十二月完竣。"[42]《满洲源流考》之最后定稿为二十卷,则李学智先生举以为证的第十八卷到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尚未完稿,故引及《三史国语解》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上文的考述结果,我们现在可以对有关《三史国语解》成书时间的各种不同记载给出一个说法。《国朝宫史续编》所称"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校正",是指高宗下达敕令、正式开始编纂此书的时间;《四库全书总目》所谓"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是指辽、金、元三史改译工作完成之后,和珅等人奏请"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重行编次"的时间;文渊阁本《三史国语解》书前提要之"乾隆四十七年奉敕撰",则是指该书正式编纂完成的时间;至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乾隆五十年说和乾隆五十一年说,是否指《三史国语解》的最后修改定稿时间,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证据。

乾隆时代整理编纂的契丹语言资料,除了《三史国语解》中的《钦定辽史语解》之外,还有一件不大为人所知的东西,这就是附在《钦定重订契丹国志》之后的《译改国语解》。此事的

来历,要从《四库全书》对《契丹国志》的改编说起。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当第一份《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即将全部抄缮完毕之际,高宗抽查《契丹国志》时发现了他认为非同小可的问题,其一是宋辽金的正统问题,其二是他认为书中的某些议论偏颇而存有华夷之见,于是馆臣遂请撤出此书,但高宗不同意这种处置办法,遂于十月十六日传出一道上谕,命馆臣改纂《契丹国志》[43]。在高宗的这份上谕中虽然没有提到契丹语词的改译问题,但既然此时辽、金、元三史已经全部改译一过,《三史国语解》也即将编纂成书,所以在对《契丹国志》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自然也将契丹语词统统加以改译,并仿照《三史国语解》之成例,将所有改译的词汇辑为《译改国语解》一卷,附在《钦定重订契丹国志》书后,是为卷二八。《译改国语解》共计196条,拿它与《三史国语解》中的《钦定辽史语解》加以对照,发现两者相同的条目出入不大,可以肯定前者是参照后者编纂而成的。不过也有个别条目例外,如《译改国语解》曰:"果勒齐,蒙古语中心也。原作高七,今改正。"而《钦定辽史语解》卷一皇子部则说:"古齐,蒙古语三十,数也。卷六十四作高七。"两者的歧异说明什么问题呢?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的书前提要,《钦定重订契丹国志》抄校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不妨作一假设:我们今天看到的《钦定辽史语解》中的这条释文,也许是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修改而成的。

关于《三史国语解》中的《钦定辽史语解》,有一个最大的谜团需要破解,这就是所谓的索伦语问题。《三史国语解》号称"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洲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44]后两句话自然有它的道理,惟有"以索伦语正《辽史》"不免让人疑惑。问题的根源要追溯到清高宗,因为正是高宗首先提出索伦人为契丹之苗裔的观点。在他作于乾隆三十三年的一首诗中,有一自注云:"按辽之后即今索伦,其语与满洲有相同者。"[45]自此以后,清朝的官书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如《清太宗实录》卷二〇天聪八年(1634年)十月壬辰有记载说:"索伦部长京古齐……等率三十五人来朝。"[46]而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奉敕编纂的《皇清开国方略》中,这条记载就变成了"索伦部(小注:辽后裔)入贡"。[47]

高宗没有详细解释他认定索伦为契丹苗裔的理由,但根据我们今天对索伦人的了解,可以断言这种说法实属无稽之谈。清朝人所称的索伦部,有广义、狭义之分。在17世纪中叶以前,满人将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地区的民族统称为索伦人,大致包括今天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康熙以后,从索伦部中分化出"打虎儿"(达斡尔)和"俄罗春"(鄂伦春),此后索伦便专指鄂温克族而言。[48]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鄂温克包括历史上的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族,1957年将它们统一改称为鄂温克族;康熙以后所称的索伦则仅指现今分布在嫩江流域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一带的鄂温克人。

关于鄂温克族的族源,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鄂温克族大部来源于靺鞨,[49]另一种意见认为鄂温克族早期属于室韦之一部。[50]但关于鄂温克语的语言谱系问

题,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都把它归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51]我们知道,今天学术界对契丹语的语系归属也已基本上达成共识,认为契丹语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中比较接近达斡尔语的一种语言。[52]由此看来,索伦语与契丹语之间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清人说:"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即达斡尔)语多类蒙古。"[53]这种说法可以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一个佐证。

尽管索伦为契丹苗裔说毫无根据,但只因其为高宗所首倡,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后来编纂《钦定辽史语解》的指导思想。今本《钦定辽史语解》在每卷卷目下都有一条题注,声称"辽以索伦语为本",而《四库全书总目》则谓《三史国语解》"以索伦语正《辽史》"。编入《四库全书》的一些官书也为之大事张扬,如《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一九《经籍考》(九)称《三史国语解》"于索伦旧语辨别尤精"。[54]当时甚至有将《三史国语解》中的《钦定辽史语解》径称为"辽史索伦语解"者,辑本《旧五代史》卷首《编定凡例》云:"凡纪传中所载辽代人名、官名,今悉从《辽史索伦语解》改正。"[55]又《续通典》卷首凡例云:"辽金元人名、地名、官名,对音旧多讹误,兹悉遵《钦定辽史索伦语解》、《金史满洲语解》、《元史蒙古语解》,另为译正。"[56]四库馆臣对索伦语与契丹语之间的渊源,有一种普遍的认同。《韵语阳秋》卷二载有余靖用契丹语作的一首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加了一条小注说:"案余靖所用契丹语,多与今索伦语不合,盖辗转讹舛,无足深考,今姑存原文。"[57]

那么,《钦定辽史语解》究竟是如何以索伦语来正《辽史》的呢?首先需要对该书的体例做一说明。此书按类编排,分为十卷,每卷都有一条内容相同的题注:"按辽以索伦语为本,《语解》内但释解义,概不复注索伦语。……"这就是说,凡是按照索伦语改译者,仅解释其词义,不再说明其依据,如:"迪里:头也。卷六十四作敌烈。"(卷一)而凡是按照其它语言改译者,均一一注明其依据,如:"苏库:满洲语皮革也。卷三十三作速古。"(卷三)这与《钦定金史语解》凡以满洲语改译者不加说明、《钦定元史语解》凡以蒙古语改译者不作说明,在体例上是完全一致的。

根据已知的体例,很容易看出《钦定辽史语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索伦语来改译《辽史》。根据我的统计结果,此书共计1639条,除部分姓氏按《八旗姓氏通谱》改译、部分地名按清代地名改译外,其它依据各种语言改译的条数分别为:

满洲语:697条;

蒙古语:609条;

唐古特语:109条;

索伦语:38条;

梵语:8条;

回语（即维吾尔语）：1条。

这个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在这部号称“辽史索伦语解”的书中，根据索伦语改译的词汇居然只有区区38条，仅占总数的2.3%；而根据满洲语和蒙古语改译的词汇倒有1306条，占到总数的80%以上！这还不算按照《八旗姓氏通谱》及清代地名改译的姓氏和地名，这部分条目共计177条，如果要追究它们的语言渊源，实际上也大多是出自满洲语和蒙古语。

再看看我对《钦定重订契丹国志·译改国语解》所作的统计。在总计196条词汇中，依据各种语言改译的条数分别为：

满洲语：80条；

蒙古语：68条；

唐古特语：8条；

索伦语：6条；

梵语：1条。（另有姓氏和地名33条，系根据《八旗姓氏通谱》和清代地名改译。）

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根据索伦语改译的词汇也只占总数的3%，而根据满洲语和蒙古语改译的词汇仍占绝大多数。

至此终于可以揭开《钦定辽史语解》的谜底了。因高宗早已认定“辽之后即今索伦”，故“以索伦语正《辽史》”理所当然地成为《钦定辽史语解》的编纂原则，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要知道，清代的索伦部只是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的很小的部族，《三史国语解》的编纂者恐怕没有一个人通晓索伦语，所以他们只好用满洲语和蒙古语来改译《辽史》。根据档案材料提供的信息，先后参与过《三史国语解》编纂工作的，至少有呈麟、穆图、七德、巴达尔瑚、依期善、善庆、巴忠、达桑阿、朝乐等九位满人，[58]而清代的满人又普遍通晓蒙古语，这就是《钦定辽史语解》中充斥着满洲语和蒙古语的缘故。另外，根据上文的统计结果，在数量上仅次于满洲语和蒙古语的是唐古特语（清人所说的唐古特语就是藏语），这又应当作何解释呢？我在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刑部尚书英廉等奏拟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赶办三史折》中找到了答案，这份奏折在谈到增派人手参加《三史国语解》的编纂工作时说道：“查有唐古特学司业巴忠、内阁中书达桑阿二员，亦俱熟于翻译，应请添派协同办理。”[59]关于唐古特学，可参见《大清会典则例》卷二“内阁”的记载：“蒙古中书十六人，内四人归唐古特学出身之笔帖式选补。（小注：西藏皆用唐古特字，故特设唐古特学，委官教习，以备翻译属国章奏及颁行敕谕之用。）”[60]据《清通典》的解释，唐古特学司业“掌学习唐古特字，以译西藏章疏文移”。[61]可以肯定，《钦定辽史语解》及《钦定重订契丹国志·译改国语解》中那些根据唐古特语改译的条目，都是出自这位唐古特学司业巴忠之手。

在洞悉了《钦定辽史语解》的编纂内幕之后，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像《三史国语解》这样一部号称“钦定”的官书，它对古籍的改译竟是如此的随意和敷衍。[62]所谓“以索伦语正《辽史》”，不过是一个幌子和一种说法而已，[63]究竟依据什么语言来改译契丹语，实际上完全取决于这班编纂者自身的语言知识。用18世纪的满洲语和蒙古语去改译10至12世纪的契丹语，不用说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更有甚者，将属于汉藏语系的唐古特语和属于印欧语系的梵语，也拿来作为改译契丹语的依据，足见编纂者之恣意妄为。

如此炮制出来的《钦定辽史语解》，其价值如何，可以想见。此书荒谬之处不胜枚举，不值得一一指摘，今姑摭取一二，以窥一斑。

卷二宫卫部释“捺钵”条：“巴纳：满洲语地方也。卷三十一作捺钵。”[64]这条释文乃是直接承袭清高宗之说，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七六有一首《于波罗河屯咏东山笔架峰》，诗云：“天开地辟此遗踪，未许南人弄藻锋。笑彼珊瑚夸宝重，镇兹钵捺永提封。”后有自注：“《文昌杂录》云：‘契丹谓住坐处曰捺钵。’按辽之后即今索伦，其语与满洲有相同者。国语谓住处曰‘巴纳’，若作‘钵捺’，尚可云音译之讹，乃并颠倒其文，则失之益远矣。总由彼时中国人言语不相通习，信手妄书，不自知其舛谬。”[65]按“捺钵”一词，在辽、宋、金、元文献中或译作剌钵、纳拔、纳跋、纳钵、纳宝，“颠倒其文”根本无从说起。契丹小字中“捺钵”一词作，见《故耶律氏铭石》3—21、《兴宗哀册》2—13。王弘力先生将该词的读音构拟为[nooboo]，[66]清格尔泰先生认为应读作[nowbow]。[67]该词由四个原字组成，其中第一个原字所代表的辅音相当肯定，《契丹小字研究》构拟为[n]，[68]苏赫先生拟作[na]；[69]第三个原字的音值，即实先生构拟为[pu]，[70]也大致可信；第二、四两个原字，刘凤翥先生拟为[bu]，[71]即实先生拟为[ɒŋ]，[72]则有待进一步验证。总之，“捺钵”一词的音译无可置疑，高宗将其附会为满洲语“巴纳”，并指责古人“信手妄书，不自知其舛谬”，诚可谓夫子自道也。

卷五职官部云：“塔玛噶赛特：蒙古语塔玛噶，印也；赛特，大臣也。卷一作挞马狻沙里，卷三十三作达马狻沙里。”[73]又卷十名物部云：“额珍锡哩：满洲语额珍，君也；锡哩，梵语威也。卷一作阿主沙里。”[74]按“沙里”一词，《辽史·国语解》已明确释为“郎君”。[75]这是契丹语里的一个常用词，契丹小字作，在迄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中出现过不下数十次，组成该词的三个原字的音值被分别构拟为[ʃ]、[ɑ]、[li]，这三个原字的拟音都经过反复验证，可以确定无疑。[76]最可笑的是，《钦定辽史语解》一处将“沙里”按蒙古语译为“赛特”，作“大臣”解；而另一处又将“沙里”按梵语译为“锡哩”，作“威”解。前后竟毫无照应，真乃是随心之所欲。

再举一个《钦定重订契丹国志·译改国语解》的例子：“纳罕：满洲语坑也。原作迺呵，今

改正。"[77]按"迺呵"一词,出自《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所记载的一则历史传说:"后有一主,号曰迺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关于"迺呵"的契丹语音义,中外学者多有讨论。一般认为,该词词尾的"呵"字是汗[xan]脱落了词尾辅音 n 的形式,正与契丹小字中的"[xa]"(可汗)相符。[78]至于"迺"字,白鸟库吉和清格尔泰先生都根据《辽史·礼志》"耐,首也"之说,释为"头颅",因释"迺呵"为"头汗",谓其乃一髑髅,故名。[79]这一解读结论言之有据,比较可信。总的来看,《译改国语解》立论为文之率意,与《钦定辽史语解》并无二致。

尽管《三史国语解》充满臆说和谬论,但它在乾嘉时代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钦定"之作,没有人敢于对它提出批评。成稿于乾隆六十年的《廿二史劄记》,其中辽金元人地名尚多沿用旧称,后来赵翼专为此作"补遗"一篇,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辑出经高宗钦定改译的辽金元各代人名、地名,作为《廿二史劄记》的附录,并谓:"臣纂辑《廿二史劄记》时,第就坊刻辽、宋、金、元、明旧史为据。今蒙高宗纯皇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所有人名、官名、地名,一一翻译改正,始知数百年以来皆承讹袭谬,今日方得本音,诚千古不刊之书,读史者宜奉为准的。"[80]这段话虽非直接针对《三史国语解》而发,但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学者对高宗极力倡导的辽金元人地名的改译是如何的诚惶诚恐。韩儒林先生指出,晚清一些学者曾使用各种托辞来抵制高宗钦定的《三史国语解》,如汪辉祖作《元史本证》,借口"僻处草茅,未由仰见";魏源撰《元史新编》,声称"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官书,即在京师亦难购觅,况南方下士乎"云云。[81]但毕竟还没有哪位学者敢于对它表示任何非议。

最早对《钦定辽史语解》提出严厉批评的是白鸟库吉氏。他在大正初年发表的《东胡民族考》"契丹篇"中,直言此书"极尽杜撰之能事,可信者很少"。[82]1933 年,冯家昇先生在《辽史初校序》中将《钦定辽史语解》存在的错误归纳为八类:一曰妄改人之姓名,二曰妄改古书,三曰妄为断离,四曰改译无标准,五曰失原意,六曰失原音,七曰不一致,八曰重误。[83]可以说全盘否定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三

除了《钦定辽史语解》之外,自明朝以来,还有几位中外学者曾致力于搜集整理或辨析考释契丹语言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补充、订正《辽史·国语解》的内容,对契丹语文研究不无裨益,因此有必要在此加以介绍和评述。

(1)明陈士元《诸史夷语解义》

此书共两卷,汇辑了历代正史中的民族语言资料。卷下《辽史》部分所录诸条,大都抄自

《辽史·国语解》,只是未注明出处而已。虽然此书契丹语言资料的来源仅限于《辽史》,但它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辽史》一书向乏善本,元至正五年(1345 年)初刻本早已失传。1931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翻刻本的残本拼凑而成,"刊版粗率,讹字亦多",[84]与明南监本、北监本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长,而《诸史夷语解义》则可补其脱误。如《国语解》"属珊"条:"应天皇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诸本均阙"有技艺者置"五字,惟《解义》不阙;又"龙锡金佩"条:"太祖从兄铎骨札以本帐下蛇鸣,命知蛇语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谓穴旁有金,铎骨札掘之,乃得金,以为带,名'龙锡金'。"诸本均阙"有金铎骨札掘之乃"八字,惟《解义》不阙。由此看来,陈士元所见《辽史》很可能是至正五年的初刻本。

该书有光绪十三年(1887 年)应城王承禧校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

(2)清厉鹗《辽史拾遗》

厉樊榭穷毕生之力纂成《辽史拾遗》一书,堪称集辽史史料之大成。是书二十四卷,告成于乾隆八年(1743 年)。其中卷二三为"国语解",征引各种文献记载对《辽史·国语解》中的若干条目加以补释;卷二四为"国语解补",辑释不见于《辽史·国语解》的词汇计 40 条,"国语之外,风俗、物产,皆缀辑焉",其内容之庞杂,一如《辽史·国语解》,其中真正的契丹语汇还不到一半。此书有道光二年(1822 年)钱塘汪氏振绮堂校刊本。

(3)清杨复吉《辽史拾遗补》

杨氏以《辽史拾遗》尚有遗漏,因纂辑《辽史拾遗补》五卷,以补厉氏之不备。书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卷五"国语解"部分共计 35 条,其中前 11 条是补充《辽史·国语解》和《辽史拾遗》已有条目的释文;后 24 条为杨氏新补入者,但大多是有关契丹名物、礼俗制度的汉语词汇,仅有个别条目才是真正的契丹语词。此书有道光五年(1825 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

(4)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

从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陆续刊布的《东胡民族考》,[85]是白鸟库吉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契丹篇"共辑录契丹语词 108 条,并作了周详的疏证。可贵的是,与《辽史·国语解》、《辽史拾遗》、《辽史拾遗补》诸书内容庞杂的情形不同,这些词汇基本上都是可以确认的契丹语词。《东胡民族考》"契丹篇"是第一次运用近代语言学方法对契丹语进行的科学考察,不过此文也存在着不少明显漏洞,由于作者有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倾向,使他的许多结论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这其实也是《东胡民族考》的一个通病。[86]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胡民族考》"契丹篇"所考释的 108 条契丹语词中,有 24 条采纳了《钦定辽史语解》的结论。白鸟库吉虽然对《钦定辽史语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并没有全

盘否定它的价值,他认为尽管书中谬误百出,"然而在参与此书编纂工作的学者当中,想必不乏精通满洲语、蒙古语、索伦语、达呼尔语、回语、藏语等语言的专家,故偶或适得其解的情况也是有的",因此将其中他认为是正确的结论予以采纳。[87]在这24条语词中(即第85条至108条),有18条为人名,6条为地名,《钦定辽史语解》均以满洲语和蒙古语为其解读依据。白鸟库吉的考释方法是,每条先引《钦定辽史语解》的释文,然后以《辽史》为据,证明该词确系契丹语词,最后再引证现代蒙语、满语以及达呼尔语、索伦语、突厥语等,对《钦定辽史语解》的结论给予证实。问题在于,在完全不了解这些人名、地名的契丹语义的情况下,仅仅根据该词与某些阿尔泰语言中的某词语音接近而加以比附,这样的解读结论是很难取信于人的。

与《东胡民族考》相关的,还有一篇专门考证契丹语言资料的长文,亦须在此一并提及,——这就是方壮猷的《契丹民族考》。此文连载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2、3期(1930年6月、9月)。据我核查的结果,方文80%以上的内容抄袭自《东胡民族考》"契丹篇",仅将文章结构做了很大变动,白鸟库吉原无分类,而方文将契丹语词分为七类(契丹国号考、契丹宫名考、王号官号及其他、地名及其他、物名及其他、动词及其他、数词考释),分门别类地加以考证。后来方氏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胡民族考》汉译本,唯独删去最后一节"契丹篇",其中隐衷大概就在于此。方氏发表于《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12月)上的《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曾被人指出有抄袭《东胡民族考》之嫌,[88]而《契丹民族考》一文的剽窃行为尚不为人所知,故附识于此。

(5)傅海波《契丹语考》

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契丹语考》,[89]是西方汉学家讨论契丹语言资料的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献。德国阿尔泰学家门格斯(Menges K. H.)认为,在契丹语中可能存在若干通古斯语言成分,他的《通古斯与辽》(载《东方学术论丛》38卷第1期,1969年)即以此设想为基础来讨论《辽史》中的契丹语词。傅海波的《契丹语考》从汉学家的角度与门格斯进行商榷,文中对30多条契丹语词的词源作了考辨,修正了门格斯由于汉学知识的不足而造成的某些失误,如将"渤海"、"步摇冠"等汉语词也视为阿尔泰语词。不过傅海波在这方面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如把契丹语"林牙"当作汉语词看待,解为"翰林衙门"之类。总的来看,尽管作者一再声称自己不是阿尔泰学家,不懂通古斯语言,但由于他具有良好的汉学修养,对汉文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史料文献源流等方面的知识都比较熟悉,因此此文有关契丹语言资料的考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一位德国学者G.道尔弗的《评福赫伯著〈契丹语考〉》也值得一提。[90]作者是阿尔泰学家,他曾给傅海波写过一封长信,讨论契丹语言问题。后应傅海波的要求,将这封信略加修改,附在《契丹语考》文后发表,这就是该文的来历。文章主要从阿尔泰学的角度探讨若干契丹语词与突厥语、蒙古语、女真语、满语的关系,可与《东胡民族考》"契丹篇"相互参阅。

(6)阮廷焯《〈辽史·国语解〉庋补》

此文载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91]作者附记云:"《辽史》一书,于契丹文字虽略无考证,惟多存其音读,因于厉鹗《国语解拾遗》之外,为之庋补,庶存契丹文字音读资料于坠绪之百一云尔。"作者主要从宋金文献中钩稽契丹语言资料共计45条,以补厉氏之未备者。既以补苴《辽史·国语解》为名,所取当只限于契丹语词,但其中阑入的汉语词汇多达13条,如喜帖、聒帐、惊鬼祟、薰天、打造馆等等;又辑自王寂《辽东行部志》的9条,大多是女真语词;真正的契丹语词大约只占半数,其中还有4条与厉鹗《国语解补》重复。

(7)于宝林《契丹民族语言的初步探查——以语词考为中心》

这是《契丹古代史稿》一书的第五章。[92]作者在前人基础之上,对汉文文献中的契丹语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共辑得375条(不包括契丹人名),可谓集契丹语言资料之大成者。缺点是考释内容过于简单,影响了它的参考价值。作者通过对这些契丹语词以及契丹人名译语用字的分析,总结出契丹语音的几个特点:第一,契丹语无送气音(或不分清浊);第二,契丹语无舌面音;第三,契丹语无卷舌音;第四,契丹语中存在着[n]、[l]不分的现象。该书附录之三为《契丹语词速检表》,可用来检索正文的内容。

注 释

〔1〕比如某些研究者有将契丹语视同于蒙古语的倾向,往往在没有其它依据的情况下,直接将蒙古语应用于契丹字的拟音和释义,爱宕松男、即实、黄振华、王弘力等人尤为明显。

〔2〕《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四一有"奉旨差归朝人教习译语"的记载,我颇疑心像《辨鸠录》这类的书籍也许在当时曾被用作契丹语通事的教科书。

〔3〕《通志》卷六三《艺文略一》仅著录为"《辨鸠录》一卷",亦不详编者名氏。

〔4〕《知不足斋丛书》本。

〔5〕此书目罕有传本,光绪间叶德辉得丁氏迟云楼抄本,并加以考证,刊入《观古堂书目丛刻》。1957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宋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宋史艺文志附编》即据此本排印。

〔6〕《大正藏》第51册,586页。

〔7〕尤袤的卒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此姑取《宋史》本传的说法。

〔8〕《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跋尤氏遂初堂藏书目录序后》,《四部丛刊》本。

〔9〕傅乐焕:《关于达呼尔族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1955年。

〔10〕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载《冯家昇论著集粹》,中华书局,1987年。

〔11〕《冯家昇论著集粹》,第147—148页。

〔12〕按《辽史·仪卫志》除了取资于《皇朝实录·仪卫志》和陈大任《辽史·礼仪志》之外,还参考过元太常卿徐世隆家藏《辽朝杂礼》(见《辽史》卷五八《仪卫志》四),所以也不能排除上述列入《仪卫志》、而又不见于今本《辽史》的条目有出自《辽朝杂礼》的可能性。

〔13〕向南编纂:《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5页。
〔14〕同注[13],第223页。
〔15〕刘凤翥:《释契丹语"迤逦免"和"乙林免"》,《沈阳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又,近年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耶律元宁墓志》谓元宁夫人萧氏"封乙失娩,从夫贵也",内蒙古宁城县出土的《办集胜事碑》所记功德主有"乙里免"(分见盖之庸《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110、435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乙失娩"、"乙里免"亦为"迤逦免"和"乙林免"的异译。
〔16〕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集粹》第118—125页。
〔17〕冯家昇:《辽史初校》之"国语解",见《辽史证误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页。
〔18〕见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书后所附《进辽史表》。
〔19〕军机处上谕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8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0〕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一七《改译辽金元三史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1册,390页。《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将此文系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21〕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三五《读金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1册,496页。
〔22〕关于清高宗改译辽、金、元三史的因由,请参看何冠彪《乾隆朝重修辽、金、元三史剖析》,载《蒙古学信息》1997年第1期。
〔23〕左步青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下册,第903页。
〔24〕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系以同治七年(1868年)粤刻本为底本。
〔25〕《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2册,863页。
〔26〕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七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6册,514页。按本卷共收入古今体诗112首,均作于戊子岁,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27〕《高宗实录》卷八九八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9册,1099—1100页。
〔28〕见《高宗实录》卷一〇二九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乙未,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1册,800—801页。
〔29〕同注[22],第28页。
〔30〕军机处原折,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426—1427页。
〔31〕《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祝德麟奏请将三史国语解刊刻完竣呈览折》,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018页。
〔32〕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82—83页,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年。
〔33〕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排印本,1933年。
〔34〕《寄谕八阿哥永璇等将武英殿所刻三史国语解赶紧刊刻完竣》,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019—2020页。
〔35〕王菡:《〈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说略》,《文献》2002年第3期,第160页。按,此《清册》系莫友芝在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踏访文宗阁时得于煨烬之余。
〔36〕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37〕冯家昇:《辽史初校序》,见《辽史证误三种》,第82—83页。
〔38〕分别见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刑部尚书英廉等奏拟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赶办三史摺》、四十六年十一月三日《谕内阁纂修辽金元史之呈麟等准以在京应升之缺分别叙用》、四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谕辽金元三史承办官平恕等俱著加一级纪录三次》、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旨议奏添纂八旗通志情形折》,载《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585页,下册第1432、1555、2226页。
〔39〕参见李学智:《金史语解正误初稿》,《新亚学报》5卷2期,1963年8月,第382—384页。
〔40〕见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八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旨纂办满洲源流情形折》,载《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718—721页。《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肯定有误。

〔41〕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日军机大臣奏折附"各馆纂办书籍清单",内有"《满洲源流考》,纂办已竣,现在缮写正本进呈"的记载,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92—93页。
〔42〕《军机大臣奏遵旨将各馆纂修拟定各书完竣日期等清单进呈片》,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586—1587页。
〔43〕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417—1419页。
〔44〕《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
〔45〕清高宗:《于波罗河屯咏东山笔架峰》,《御制诗三集》卷七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6册,514页。
〔46〕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270页。
〔47〕《皇清开国方略》卷一九,太宗天聪八年十月壬辰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1册,287页。
〔48〕参见王锺翰:《达呼尔人出于索伦部考》,载《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99—116页;李治亭:《清初索伦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163—170页。
〔49〕陈玉书(述):《略论鄂温克族的来源问题》,《民族团结》1962年第5、6期合刊,32—38页。
〔50〕吕光天:《谈鄂温克族的来源》,《民族团结》1962年第5、6期合刊,39—40页。
〔51〕参见胡增益、朝克:《鄂温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页。
〔52〕参见刘凤翥:《略论契丹语的语系归属与特点》,《大陆杂志》84卷第5期,1992年5月15日,19—26页。
〔53〕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按此书作者为满人,系鄂尔泰之曾孙。
〔5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7册,145页。
〔5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7册,6页。
〔5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9册,8页。
〔5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9册,94页。
〔58〕见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刑部尚书英廉等奏拟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赶办三史摺》、四十六年十一月三日《谕内阁纂修辽金元史之呈麟等准以在京应升之缺分别叙用》,载《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585页、下册第1432页。
〔59〕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585页。
〔6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0册,73页。
〔61〕《清通典》卷二六职官四"理藩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2册,345页。
〔62〕《三史国语解》中的《钦定金史语解》和《钦定元史语解》也同样是敷衍了事、谬误百出,可参见李学智《金史语解正误初稿》,《新亚学报》5卷2期,1963年8月,第377—429页;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载《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26—232页。
〔63〕然而现代学者仍有蒙蔽于《四库全书总目》之臆说者,如徐浩《廿五史述要》(台北世界书局,1956年)谓《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辽史》部分以索伦语正《辽史》,厘订伪讹,尤便学者"云云。
〔6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6册,13页。
〔65〕同注[45]。
〔66〕王弘力:《契丹小字宫殿解》,《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62页。
〔67〕清格尔泰:《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9页。
〔68〕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3页。
〔69〕苏赫:《〈故耶律氏铭石〉考释》,《文物资料丛刊》第5期,1981年12月,172—173页。
〔70〕即实:《从天子说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56、67页。
〔71〕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258—261页。
〔72〕同注[70],第62、67页。

〔73〕同注[64],第57页。
〔74〕同注[64],第115页。
〔75〕关于郎君(沙里),可参看费国庆:《辽朝郎君考》,《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60—65页;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267—291页。
〔76〕同注[68],第117—118、152—153页。
〔7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3册,797页。
〔78〕参见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4期,58页;即实:《从天子说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56页。
〔79〕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之十"契丹篇",见《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262—263页;清格尔泰:《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2—3页。
〔80〕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下册,856页,中华书局,1984年。
〔81〕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谈谈辽、金、元史籍中少数民族的译名等问题》,见前揭《穹庐集》第227、549—550页。
〔82〕见前揭《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294页。
〔83〕同注[37],第86—87页。按《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五,于1933年12月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84〕见百衲本《辽史》张元济跋语。
〔85〕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四月至大正二年(1913年)七月连载于《史学杂志》21编第4号至24编第7号,后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63—320页。
〔86〕请参看缪钺《北朝之鲜卑语》一文对《东胡民族考》"鲜卑篇"的批评,见同氏《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82年,53—77页。
〔87〕同注[82],第294—303页。
〔88〕见《燕京学报》第9期封三,1931年6月。
〔89〕[德]H.福赫伯:《契丹语考》,原载德国《中亚研究》第3期,1969年,7—43页;黄振华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刊印,1985年6月,65—83页。
〔90〕[德]G.道尔弗:《评福赫伯著〈契丹语考〉》,原载德国《中亚研究》第3期,1969年,45—49页;黄振华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刊印,1985年12月,139—141页。
〔91〕香港中文大学刊行,1987年,163—174页。
〔92〕见于宝林《契丹古代史稿》,黄山书社,1998年,259—359页。

朝鲜司译院"日本语学"教科书

鸟云高娃

朝鲜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才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设有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到了17世纪,司译院将女真语学改为清学,以满语教学替代原有的女真语教学。朝鲜司译院"日本语学"教科书用于"译科"科试,有时也被称为"译学书"。"日本语学"早期读本有启蒙读物,壬辰、丙子两乱以后以会话体读本和辞书为主。

对朝鲜司译院"日本语学"这一课题,国内学者并未进行研究。日本和韩国学者对此多有研究。早在1914年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就已对朝鲜司译院的"日本语学"教科书进行了研究。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1]和《朝鲜日、汉、满、蒙语辞书》,[2]对司译院日、汉、满、蒙等"四学"的读本、辞书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在朝鲜的昔日日本语学书〈捷解新语〉》[3]一文,对朝鲜"日本语学"教科书之一《捷解新语》进行了分析。在1916年他又发表了《朝鲜的日本语学》[4]一文,探讨了朝鲜司译院"日本语学"的情况。他在《朝鲜语学史》[5]一书的第四章"日本语学"中,探讨了朝鲜王朝时代司译院"日本语学"的辞书、读本、学者等问题。新村出的《朝鲜司译院日、满、蒙语学书断简解说》[6]一文,介绍了"日本语学"的《捷解新语》、《捷解新语文释》、《邻语大方》等读本的情况。

韩国学者郑光的《译学书研究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7]一文,探讨了朝鲜王朝早、中、后期倭学书的刊行情况。他在《译学书研究》[8]一书的第四章中,对倭学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9]一书中也对"日本语学"书籍进行了研究。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就朝鲜司译院"日本语学"的读本、辞书的编撰、刊行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司译院"日本语学"的设立

在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官吏就有学习周边民族语言的传统,旨在与周边民族交往中充当口译人员。早在新罗时代就出现了这些被称为译官的官吏学习外国语的现象,但直到高丽